

大河之北

红色篇(下) 河北人文地理解读



(上接第十版)

忠诚

初心：一位县委书记的名利观

在今天迁西县前韩庄村韩东征纪念馆，有一张珍贵的照片，是1949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期间各解放区农民代表合影。合影前排左三的冀东代表，就是韩东征。这张合影拍摄后不久，他便参加了开国大典，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

韩东征，首任中共迁安(西)县委书记。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北省水利厅副厅长等职。

在中共首任县委书记这一特殊群体中，韩东征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的官职不算大，名气也不算高，但他一生恪守的名利观，却堪称一代干部的“标杆”。

1928年11月25日，迁安县第一个党小组在前韩庄村诞生，韩东征任小组长。不久，前韩庄建立了党支部，韩东征又担任书记。

但追溯这个党组织的历史，韩东征的入党介绍人韩文华的贡献不可不说。

大革命失败后，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韩文华受党组织派遣返回家乡，在前、后韩庄一带主办农民讲习班，秘密宣传革命。正是受韩文华的启迪，韩东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，成为党在迁西地区发展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既然党组织由韩文华“播火”，书记为何却由韩东征担任？

“这样安排完全是出于工作的考虑。韩东征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，出身贫困，由他负责领导开展工作更容易得到群众的支持。事实上，韩文华此后一直在协助韩东征工作。”迁西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马振表示。

不讲条件，不计个人得失、地位高低，自觉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，这是韩东征的入党启蒙，也成为他政治生涯永恒的底色。

1933年，受党内“左”倾错误的影响，京东特委决定在迁安举行农民暴动。韩东征等曾因拒绝接受特委发动武装暴动的错误指示，被撤销领导职务。但政治上遭到的打击，却丝毫没有影响韩东征的革命热情。

1934年1月迁安暴动失败后，他主动承担起收拾残局的重任，深入到金厂峪金矿，领导金矿工人罢工斗争，为恢复地方党组织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。长城抗战爆发后，他还和高机先一同组织起百余人的“抗日自卫团”，配合二十九军于喜峰口、董家口等长城要隘抗战，亮出了共产党坚决抗日的鲜明旗帜。

1934—1935年间，为支援民族英雄孙永勤抗日义勇军，韩东征秘密派中共党员进入孙部，为该军政治整编创造了条件。

直到1936年，刘少奇同志奉命到北方局主持工作，纠正了组织内“左倾”的错误路线，韩东征才被恢复了组织关系和领导职务，第二次出任迁安县委书记。

1942年春，由于工作需要，韩东征再次欣然接受由县委书记改任县委组织部长。

战争年代如此，和平年代亦然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韩东征一直从事水利战线的工作。先后任蓟滦河务局局长、河北省水利厅农田水利局局长、河北省水利厅副厅长、水电部漳卫南运河管理局副局长兼党委副书记，后又兼任潘家口水库工程局副总指挥等职。

大河之北，河湖众多，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河北水患严重。从北到南，又从南到北，韩东征几乎走遍了河北各大流域。

用今天很多人的眼光看，韩东征这一次次的调动，并非都是“升迁”，但根据河北各地与干旱、洪涝斗争形势的变化，韩东征完全服从党的工作需要，始终奋战在急难险重的岗位。

河北，是全国建党比较早的地区之一，又是革命老区，这块土地上培养出一大批像韩东征这样久经考验、革命意志坚定的优秀干部。

“事实上，在解放战争后期，华北解放区被中央作为一个培养教育干部的基地。”河北省党史研究室编研处处长阎丽介绍。

早在1948年6月，中央就委托华北局开办华北局党校，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干部。平津解放后，中央又指示华北局，从社会青年学生中大量吸收培训干部，于1949年2月成立华北人民革命大学，先后入学者达12000余人。

1948年11月，华北局作出《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》，其中就明确提到，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

进军，华北解放区已处于巩固的地位，可以而且必须比较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工作，这就要求我们党能提供更多优秀干部，担负目前的工作。又由于革命日益接近全国的胜利，也要求华北党的组织提供更多的优秀干部到其他各地去工作。

就这样，在新中国成立前后，大批优秀的河北干部或走向全国或留在河北。

他们有的从华北人民政府走向北京，构成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最初的班底；有的抛家舍业、随军南下，投身南方的解放和建设事业，担当起重要的领导责任；还有很多人像韩东征一样，成为河北地市级干部的中坚力量。

2021年是建党百年华诞，中共中央首次颁发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，我省有47.97万老党员获得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。

“光荣在党50年”，表达的是党和人民对他们的深深敬意，而他们也用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的汗水和平凡岁月的坚守告诉世人，党员的初心是什么，永远有多远。

牺牲：两枚弹头的震撼回响

2020年9月中旬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，保定高阳县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文物清单上增加了两件特殊的文物。

这是两枚子弹弹头，笔筒形状，豇豆大小，像两块烧焦的煤炭。

它们来自遥远的抗美援朝战场，曾在一位军人体内“陪伴”他走过了近70年的人生。

2020年9月2日，95岁的高阳籍抗美援朝老兵李景湖在北京病逝。殡仪馆工作人员在收集老人骨灰时，发现了这两枚弹头：一枚在头部位置，一枚在腰部位置。

两枚弹头“咣当”落入托盘，这是李景湖留给世界最后的声音，也是英雄的河北儿女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震撼回响。

1951年，李景湖踏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。那时候的他，是一名已经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战士。

李景湖参军时只有13岁。当时日军在他的老家高阳制造了惨案，杀害了180位八路军和村民。惨案之后八路军很快又在博士庄跟鬼子打了一仗。感到八路军是真抗日，李景湖第二天就参了军。

当时和李景湖一起跨过鸭绿江的燕赵儿女，不仅有他那样身经百战的老战士，还有踊跃报名的新兵。

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，成千上万的燕赵儿女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朝鲜战场，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1月15日，仅仅一个半月，河北就有1879名青年学生和699名青年工人报名参军，超过原定目标的11.6%。到1953年1月20日，全省共47385名合格新兵参军入伍。

1951年初，李景湖来到朝鲜战场，在63军187师担任通信科长，负责埋管布线，保障整个师的信息联络。

不久，他便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关键一战——铁原阻击战。

在战场上经历过什么，李景湖几乎对家人只字未提。但在相关资料里，我们了解到这场战斗打得多么惨烈：当时2万多人的63军几乎把能调动的所有兵力都投入战斗，相关干部、通信员，甚至连炊事员都上了战场。

铁原阻击战，美军创造了1小时打出4000吨炮弹的纪录——比美军标准弹药消耗多了5倍。这场惊天动地的大战足足打了13天。在美军的重火力下，63军全副官兵的衣服被美军燃烧弹烧破，战斗结束时，战士们身上只剩一条裤衩和弹壳空空的步枪。

经过铁原阻击战一役，美军再也无法承受越来越多的伤亡，1951年6月10日转入全线防御。

因通信保障工作有力，李景湖在这场战斗中荣立三等功。

铁原阻击战的惨烈，只是抗美援朝战争之残酷的冰山一角。但面对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，一位河北儿女打出了血性和威名：

河北籍志愿军李凤林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、特等功臣，河北籍志愿军赵先有被授予特等功臣，他们的事迹被巴金写进小说，成为电影《英雄儿女》英雄王成“向我开炮”光辉形象的原型之一；

高阳籍女志愿军解秀梅，是抗美援朝战场唯一一位女一等功臣，也是电影《英雄儿女》中王芳的原型之一；

朝鲜战场上曾产生6位立下赫赫战功的空军一级战斗英雄，其中，就有两位河北籍英雄——刘玉堤和孙生禄；



李景湖 李文新供图

韩东征 马振供图



袁雅冬穿上写满签名的白大褂。(河北日报资料片) 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摄

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，唐山籍抗美援朝老兵王占山荣获“七一勋章”……

抗美援朝战场上，这样的燕赵儿女太多太多。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的河北籍烈士可查证的就达11853人。他们中，有家喻户晓的英雄，也有无数李景湖这样默默无闻的战士。

1953年7月，李景湖在朝鲜坪山南村战斗中负伤致残。填写于1958年的《军官退出现役申请报告表》显示，李景湖“健康状况”为“头疼”“右手及右脚各负伤一次，已残废”。

“我父亲一辈子走路抬不起腿。”李景湖的小女儿李文新说，直到2001年，李景湖在做CT检查时，才发现大脑中的“金属异物”——从负伤直到去世这漫长的60多年，李景湖一直被头疼折磨，在生命的最后几年，往往疼得彻夜难眠。在李景湖体内作祟的，正是这两枚从朝鲜战场上带回的子弹。

为什么战旗美如画，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。硝烟远去，透过两枚子弹，在这场跨越70年的“对话”中，李文新读懂了父亲，我们也读懂了那许许多多河北英雄儿女无声的爱和誓言。

使命：一件写满签名的“战袍”

在今天的河北医科大学校史馆，珍藏着一件特殊的白大褂。

白大褂上，红色、黑色，大大小小的签名遍布全身。这是武汉市第七医院最后一个新冠肺炎病区关闭时，所有当班的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和武汉第七医院的部分医护人员，以及武汉当地的大巴车司机、交警等共同签下的。

白大褂的捐赠者，就是首批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队长袁雅冬。

2020年1月27日，大年初二，这件白大褂被袁雅冬整齐地放进行李箱——此行的目的地，是当时的疫情风暴中心武汉。

2003年战“非典”，2009年斗甲流，武汉之行已经是袁雅冬的第三次逆行出征。

这次新冠肺炎疫情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、感染范围最广、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。和她一起奔赴武汉前线的，还有来自省市各级医院的149名队员。

“医疗队员们，都是普通人，有的比我的孩子还小，哪一个不是家里的宝。那种情况下到武汉，谁不怕？”回顾当时的情形，她下意识挺起身子，“但越是这种时候，越要意识到自己是医护人员，是党员，肩上有责任的。”

1月27日凌晨4时，这件白大褂随着袁雅冬抵达武汉。

但由于新冠肺炎病毒的超强传染性，当袁雅冬进入武汉市第七医院的“红区”时，它只能被留在行李箱里了。

而袁雅冬必须在刷手衣外边，套上严严实实的防护服。这副装扮，对袁雅冬这位抗疫老将来说，也是第一次。

“当时物资供应紧张，防护服穿一套就消耗一套。”由于此前防护服不属于各大医院的储备物资，河北支援湖北第一批医疗队出发时，只有袁雅冬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带去的600套防护服。但这，几乎也是该院全部的“家底儿”。

为了节省防护服，150名队员练习穿脱防护服，都是边学边干，从没有专门拿出一套来练。有的队员鞋套踩破了，就只能用垃圾袋把鞋套上。甚至，有一次袁雅冬只能穿着一件薄如蝉翼的隔离服进入红区，四处漏风，只能用胶带粘。

不过，令袁雅冬感到安心的是，防护服短

缺的问题，迅速得到了缓解。在距离武汉900多公里的河北家乡，医药企业第一时间开足马力、争分夺秒地复工复产。

一组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：2020年1月19日至4月15日，国家累计从河北调拨医用口罩410.12万只，医用防护服99.04万套，隔离面罩68.03万套。其中防护服和隔离面罩高峰时调拨比例分别达我省日产量的70%、100%。

身在武汉，河北医疗队员们最幸福的一件事，就是深夜到火车站，接收“老家”运来的物资。

隔离服、护目镜把人包得严严实实，医护人员需要在隔离服上写上名字，方便交流。袁雅冬写得异常凝练，只有五个字——“河北 袁雅冬”。

“不管具体来自哪个医院，我们都代表着河北。”袁雅冬说。

打出河北医疗队的水平，平平安安把队员们带回来，这是袁雅冬出征时定下的两个必须完成的任务。但与前两次抗疫不同，这次袁雅冬是带了一群陌生的同事，跨地域作战，疫情重、时间短、挑战异常大。当时武汉七院没有呼吸科，但河北选派的医疗队员几乎都是与呼吸、感染、重症相关的专业医护人员。

“这时候，我们必须得把这个担子担起来，尽量收治更多患者。”袁雅冬说，绝大多数医疗队只对接一个病区，但首批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几乎是接管了一家医院，包括4个病区和重症监护室以及检验科的工作，在此基础上又不断扩大病区增加病床，大大缓解了住院难。

“正常的医护配比在武汉七院应该是医师数与床位数之比0.5:1，护士与床位数之比1:1，但是我面对的病人远超过我们的人手。此外，住院患者中有70%的重症，治疗难度很大。”

作为队长，袁雅冬的责任除了救人，还承诺团队零感染。

从到达武汉的第二天，袁雅冬要求每一名医疗队员在离开酒店前和回到酒店前测量体温。队员全部上报体温常常要到半夜，可不管多晚，袁雅冬都要等汇总完体温再休息。

由于测温部位不同、测温时间差异或处于生理期，一些队员测温时会超过37℃，为了帮他们缓解心理压力，她还要挨个去房间或打电话了解、慰问。

“当时也不知道困不困了，反正你就知道你每天有一堆事儿要干，干不完就休息不了。”在武汉的这两个多月，袁雅冬没有轮休过一天。

巨大的消耗，令她脱发严重。“当时我每次一回宾馆，就看见我床上的一层头发。”床上头发太多，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，袁雅冬总怀疑是有人趁她没在时到她床上睡觉了。

“从武汉回来，我这头发掉了一半，这个卡子都卡不住了。”袁雅冬摸摸头上的一个淡紫色发卡说。

在袁雅冬的带领下，第一批医疗队重症救治成功率在武汉排名前三，累计收治病人429人次，全体医疗队员零感染。

武汉市第七医院最后一个新冠肺炎病区关闭当天，袁雅冬想着要请大家留下“墨宝”，作为武汉抗疫的纪念。虽然隔离服是当之无愧的“战袍”，虽然当时防护服的供应已经十分充足，但拿一件崭新的隔离服签名，“怎么想都舍不得”。

思来想去，她还是请大家把名字签在了白大褂上。

2020年3月20日，经历了50多个昼夜的奋战，袁雅冬终于凯旋。

和她一样安然归来的，还有1000多名在隔离服上写下“河北”二字的医护人员。

2020年12月20日，袁雅冬将这件白大褂捐赠给母校——河北医科大学。

这是从武汉踏上归程的一刻，袁雅冬认定的必须要做的一件事。

“新冠疫情是我从医生涯中第一次以医务人员为‘作战’主体的重大事件……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我们后面的医者能否像我们这样知重负重，专业执着，勇于承担，勇于奉献，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。”捐赠仪式上，袁雅冬寄语年轻的医者。

(感谢河北省党史研究室、河北省档案馆、西柏坡纪念馆、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、八路军一二九师纪念馆、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旧址纪念馆、唐山开滦博物馆、磁县直南党史馆、冀南革命纪念馆、直隶省立第七师范纪念馆等单位和个人对本报道的大力协助)



袁雅冬机战战场。河北日报记者 阎 明摄